

我和我的祖国

征文选登

戎马军旅路

文 邵祝庆(文化花园)

我生于1949年11月,与共和国同龄,今年正好70岁。人的一生有诸多回忆,而我最难忘的是28年的军旅生涯。

1968年,我参军入伍。3月18日,部队到达浙西山区一个在建的战略仓库,我们120多人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新兵。新建的营房住着工程兵,我们只能借住在当地的一个大礼堂。没有自来水,洗脸、刷牙、洗衣服、洗澡等都在村庄旁的小溪里解决。到了冬天,为了洗个澡要到驻地附近的一个钢铁厂,来回步行近10公里。

这样的部队生活让我们这些新兵有些失望。针对这种状况,部队做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,使我们很快认识到:战略仓库是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,无论在什么岗位,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虽然身处山沟,但是政治教育、军事训练、专业培训等都毫不含糊。我们自己动手,砌砖垒墙,土法上马修建大礼堂;开荒整地,养猪种菜,改善部队的生

后方战略仓库都在山区,不少军官为扎根山沟,将配偶、孩子迁往了部队。由于山区教育相对落后,据有关部门统计,当时南京军区有近百个后方仓库,但很少有军官的孩子考上大学。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话:“为了国防建设,我们是献了青春献子孙”。

1971年7月,我被调到南京军区后勤某分部司令部工作,一干就是18年。当时我们这个分部主要任务是负责上海和浙东南方向



部队的平时时后勤保障,分部所属有兵站、汽车团、船队、医院、仓库等30余个保障分队。为了提高机关的组织指挥和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,始终将战备训练摆在重要位置,经常组织各种演练。

1986年,上级命令我们分部组织上海方向抗登陆作战后勤保障实兵演练,为此成立了演练组织机构,抽组了汽车营、兵站、野战医院、仓库等演练分队,从理论研究、编写预案、组织分练到综合演练,历时半年时间。

当时,我担任实兵演练现场分练和合练的总指挥。为了更接近于实战,我们还协调空

军和地方消防部门,请他们派出飞机和消防队参加演练。我们还请上级协调抽调了所属他部的摄录像设备,现场实录转播实兵演练情况,使总参和军区首长 in 组织考核验收时能形象直观地看到整个演练过程。这次演练获得了圆满成功,机关和部队得到了锻炼,我个人也荣立了三等功。

“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,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”。我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,对祖国始终坚守着一片忠诚,每每回想起自己的军旅岁月,总是令人兴奋与激动,为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而自豪。

1949年到上海

文 张克松(正文居民区)

1949年2月,我与同村的20多个青年一起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当时还不满18岁。



1949年4月20日,渡江战役打响,解放军一脚踏过长江。4月23日,南京解放。我们跟随部队南下过长江,我们连队负责看管押运人民币。这些钱都是用新的麻袋装封好的,一个班保护一辆卡车。当时沿途中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国民党的散兵游勇。我们在卡车上架好轻机枪,每个战士手中都握好步枪,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

车队到达长江北岸准备过江,国民党的飞机正在轰炸镇江,镇江的油库遭到破坏。岸边只有大木船,两只船锁在一起,尽管这样,它的承载能力也不大。为了安全保险,我们先把车上的“货物”一一搬运上船,然后让空车开到船上。到了长江南岸,先让卡车开到岸边,我们再把“货物”从船上搬运到卡车上。一切就绪后,我们连夜离开镇江,并顺利到达丹阳,圆满完成任务。

在丹阳期间,部队首长告诉我们说,根据上级的指示,“我们这支部队今后的任务就是保卫解放后的大上海。因此,要做好入城前的准备工作。”为此,我们学习了入城守则。当时形势发展神速,5月27日上海解放。

5月底,我们部队乘火车从丹阳到达上海,先住苏州河恒丰桥第五仓库待命。几天后接到任务,我们八连进驻北四川、虹口、提篮桥三个公安分局,协助分局维护社会治安。我们二排和连部驻守在提篮桥分局,任务是看好大门,保护分局的安全。辖区内如发生强盗等类案子时,我们警卫排也要赶赴现场,协助办案的同志。

7月末,上海遭受了一场大台风。当时唐山路、海门路都有积水,汽车抛锚,许多大树和有的电线被刮倒、刮断。我们所保护的仓库存有大批重要器材,但房屋设施不安全,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,物资有泡水

文 王勇华(航天居民区)

上世纪60年代初,上海市科委将我和20多位同事从新中动力厂抽调到机电二局(上海航天局的前身)参加航天事业工作。

1966年10月初,“红旗一号”第一批产品运往大西北的东风基地进行批次抽检打靶试验,成功后便可批量交付部队。我作为试验队成员之一,参与了本次试验的全过程。

我们试验队进驻东风基地时,适逢我国中程导弹携带核弹头进行核武器联合试验,这次试验是解决有“弹”无“枪”的问题,发射方向是新疆罗布泊地区。被誉为“中国航天之父”的钱学森在基地指挥这次重要的核武器联合试验,当钱老听说上海机电二局的一支试验队在基地时,提出要见见上海的试验人员。

听说钱学森要见我们,大家心情都很激动。我和两位同事按照通知要求,提前10分钟来到东风基地第一招待所。看到钱老进屋,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,钱老摆摆手让我们坐下。

钱老说:“看起来上海工业局的人都很年轻呀,导弹事业大有希望”。我们汇报了这次靶试产品的质量和发射准备情况。钱老表示

酒泉往事



“产品质量很重要,一定要事先抓”。他要求我们必须绷紧质量这根弦,丝毫不能马虎,只有一丝不苟的反复测试检查,把所有的问题都排除在上天之前,才能稳妥可靠,靶试才能一次成功。临别,钱老与大家一一握手,并预祝上海的地空导弹靶试获得圆满成功。

根据钱老的指示,在靶试前,我们对“红旗一号”的靶试产品再次复查,其中上海仪表

厂在自查过程中发现自动驾驶仪上的某只线绕电阻存在质量问题,于是试验队立即要求从上海调来四件备份产品替换。一切准备就绪,正当我们到达发射基地进行实弹靶试时,突然接到通知,说是导弹核武试验将要进行,之前所有在基地的人员要进行防辐射模拟演习。为此,上海的打靶试验暂停,等待通知。

大约到了凌晨时分,我们看见天空中升起了一颗信号弹,这是即将进行核武器联合实验的前奏。我们根据命令立即用毛巾捂住脸趴下,大家都紧张得大气不敢喘一下,接着就听到巨大的轰鸣声,越来越响,连身下的戈壁滩也微微震动……

东风航空城中心广场上,一个大讲台已布置停当,讲台上方的横幅标语上写着“热烈庆祝首发导弹核武器联合实验成功”。一架大型直升机缓缓从空中降落到广场讲台旁,只见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在钱老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台。叶帅代表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宣布“两弹”试验获得圆满成功。顿时,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

好事成双,在钱老的关心指导下,“红旗一号”导弹产品质量得到保证,满足了飞行试验要求,靶试以两发两中的优良成绩取得成功,圆满完成了这次导弹试验任务。

警察岁月

文 酈明正(仁德居民区)

我出生在江苏丹阳一个贫农家庭,童年经历坎坷。1954年,初中毕业,我考入上海公安学校,在学校培训二个多月之后,分配到徐汇公安分局永嘉路派出所成为一名社区民警,当时叫户籍警。

根据上级指示,我从邮递员将信件投入居民信箱中受到启发,在全区首创设立“警民联系箱”,上门受理户籍事宜。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,后来在全区推广,成为依靠人民群众,做好地区治安工作的重要途径。

在26年的警察生涯中,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。1956年,我荣立一等功,出席全国人民警察治保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;1959年,出席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,并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;1964年我又当选上海市第五届人大代表。

1970年初,上海在江苏沛县开发建设大屯煤矿基地。沛县,因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里而闻名遐迩,东北面的微山湖是当年铁道游击队驰骋的战场。这里地处苏鲁交界处,治安情况十分复杂。为了加强大屯矿区的保卫工作,1979年底,我奉命从上海调到了这个偏僻的煤矿,这是我警官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

工作环境变了,我告诫自己:“好汉不提当年勇,一切从头开始。”我同新同事一起,骑着自行车下基层,下矿区摸情况,开座谈会,同时也将上海公安保卫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传授给大家。我们公安处被公安部授予“全国经济文化保卫系统先进集体”称号。

“光打不防,等于白忙。”这是我的一句口头禅,也是多年公安保卫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。在我担任大屯煤矿公安处处长之后,我将大屯矿区的治安防范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。

1990年8月,大屯煤矿入室盗窃案频发,我立即部署开展打击“白日闯”专项斗争。顶着似火的骄阳,同志们抓获了一批“白日闯”犯罪分子。经过调查考证,我认为除了严打之外,给职工住户安装防盗门也是治本措施之一。于是,我提出在全矿区为职工住户安装防盗门,得到领导批准。至1993年,全矿区居民安装防盗门达到88.3%,有效地遏制了“白日闯”案件发生。

我在大屯工作生活近20年,为保一方平安,将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大屯矿区。我的妻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,老伴平时包揽了所有家务,毫无怨言,还时刻为我担惊受怕,正是有了她在幕后操劳,才使我无牵无挂地驰骋在打击犯罪、保护人民的战场上!

